

# 女性主義的政治學方法論\*

石之瑜\*\*

自從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興起以來，政治科學的方法哲學便一直受到經驗研究的影響，其中表現最突出的，便是對於統計方法與演繹邏輯的高度重視。政治科學哲學的發展，嚴重地挑戰了傳統政治學中對思想、歷史以及制度的研究，也否認了政治學者一向仰賴的智慧的、而非經驗的判斷。本文的目的，在檢討當代政治科學的方法學，剖析它的哲學前提，批判它的盲點。質言之，當代政治科學方法隱含了強烈的男性觀點，因此對於政治科學化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與不可逃避的僵化。在此，女性主義的思潮，對於政治學界的科學迷信，當有所助益。

## 一、當代政治科學的哲學

咸信科學的意義，在於對自然環境作客觀的理解。既然是強調客觀的理解，則理解的主體與被理解的客體自應是處於分離的狀態<sup>(1)</sup>。即令是對人自己的研究，都是假設人可以不受自己主觀的影響，來理解自己。所以在科學分析中，人可以抽象地與自己分離。如果人不能做到這種抽象分離，則從事抽象理解的各個主體之間，便無法作客觀的溝通，講求客觀理解的科學哲學便會失去意義。

工業革命被稱為科學革命，反映了人對於自己進行客觀分析能力的喜悅。矛盾的是，客觀分析的能力，使人類相信自己可以藉由對客觀規律的發掘，進一步操縱自然。所以，人不僅是與自然分離的，甚至可以利用自然，改變自然，以至在科學的境界裡，人與自然變成是對立的了<sup>(2)</sup>。在政治科學裡，政治學家儼然可以對各國的政治現象作比較

---

\* 徐振國、高朗、梁雙蓮及一位匿名審查者等曾對本文若干觀點提出指正，特此致謝，唯文責概由作者承擔。

\*\*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本篇審查完畢定稿日期：1994年3月11日）

註 1：「誰是知識的主體？」為女性主義知識論的核心問題，客觀分析通常否定了主觀情感；但過度重視主觀情感，認為知識只是相對的說法，則等於否定了知識的存在。取其中道的說法，則認為主觀認知必為知識的一部分，但卻未必能構成知識的全部（Code 1982：157-174）。

註 2：人與自然的對立，與在古典哲學中男與女的對立，理性與感情的對立是平行的。人能控制自然的幻想據說使得男性為主的醫學界，在論及女性的身體時，好像特別容易像對待自然一樣，任意可以除去或加上一些部分，缺乏根本的尊重，這也顯示，在科學的領域裡有人在和自然對抗的情緒（Hubbard 1984）。

研究，在了解了政治運作的結構與原理後，提出政策建議，以能對現實政治有所影響。

但是，政治科學不同於一般科學之處，在於它無法經由研究與實驗的控制，觀察選定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因此也難以作準確推斷。這是何以政治科學在科學化的過程中，必須先建立政治現象可觀察的客觀基礎。統計方法適時提供了解決之道，而在政治學力求滿足當代科學規範的努力中，作出貢獻<sup>(3)</sup>。統計方法的引用，假設了政治現象具有可以量化的特質。量化的目的，則在於使政治學者能不受主觀背景之侷限，觀察到所有其他人都可以看到的現象，從而為政治學者進行價值中立的分析，建立了可信性<sup>(4)</sup>。

統計方法對量化的仰賴，使得一些無法量化的政治現象，被摒除在政治科學研究的範圍之外<sup>(5)</sup>。無法量化的現象缺乏客觀的觀察基礎，因而不是可供信任的知識。科學的標準何在，於是有了更明確的定位。照卡爾巴伯的說法，科學必須是可以驗證為誤的主張（或假設）<sup>(6)</sup>。任何科學的學說，都必須經過新事實不斷地驗證，如此保證科學的理論，是價值中立的與可以觀察到的。

這種要求「可以驗證為誤」的科學標準，相當程度地否認了單純資料地堆砌具有科學性。比如，經濟發展的程度可以用像國民生產毛額或基尼分配係數等量化觀念表達。然而，因為這種現象陳述的過程中，不發生驗證為誤的問題，因此還不能算是嚴格定義的科學，只能說是科學理論的以發展的基礎<sup>(7)</sup>。科學所指涉的範疇，是兩個或兩個以上量化變數的相關性分析<sup>(8)</sup>。這種相關性分析不受到時間與空間因素的左右，具有普遍性，因此才是變數與變數之間真實的關聯。既然，科學理論不具備時間特性，則其在對未來的政治現象解釋時，仍應恆真，因而今日提出的科學理論，必須在未來仍能檢驗，否則便不具備可被驗證為誤的特性，也失去科學的屬性<sup>(9)</sup>。

註 3：計量政治學現已成為美國大學政治學系必須開授的課程，根據美國政治科學學會的報告，教授計量政治學的畢業生，在經濟不景氣時，仍能維持高就業率，顯見需求之殷切。

註 4：數理模式的功能，在於總能完成它原本設計要完成的工作，所以有人認為，科學必須是由實證主義的陳述所組成 (Kline, 1980)。

註 5：如果社會問題來自不能科學化的部分，則科學研究反而會加深社會問題 (Restivo, 1988)。

註 6：在這個條件下，科學證據必須具備否定理論的潛力才有價值，在此，十六世紀以來對於科學的定義變得十分狹隘 (Popper, 1959)。

註 7：國民生產毛額是依定義計算得出的，要驗證對錯的話，只有依定義再做一次，當然結果應該相同，最多是發生技術上的計算失誤而已，而且每一個生產毛額的計算，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與實證主義的陳述無關。

註 8：這裡隱含了強烈的自由主義與普遍性的個人主義，因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被認為可以享有通往知識的相同能力 (Jaggar, 1983)。

註 9：超越時空與歷史的科學否認了感情的作用，也因而否認女性氣質對科學知識的貢獻，其實感情與智慧在科學知識建構中應是互補，而非互斥的 (Jagger, 1989)。

同理，歸納法的目的，只是在發現一種現象，而不是驗證過的變數之間的相關性，故也不能屬於嚴格定義的科學範疇。對於實證主義者而言，科學假設產生的過程是非科學的，科學只及於對假設的客觀檢定，而不包括檢定之前的步驟。此外，歸納法必須與科學理論的檢定分開，也是因為如果根據歸納的資料得出了一些理論假設，則這些假設的檢定，就不能依賴同一批資料，否則就形成循環論證，失去了可以驗證為誤的特性。但只要把歸納法摒除於科學的範疇之外，不問理論假設的來源為何，則不會發生科學範疇中循環論證的尷尬<sup>(10)</sup>。

不過，政治科學家並不反對歸納法，因為，任何理論即使暫時證明為可接受，仍必須透過不斷累積的新資料繼續考驗，這些新資料有的是來自前此未被研究到的地區的已發生現象，有的是來自新發生的現象，所以，即使是透過歸納法得出的理論假設，也仍可以因為新資料的加入，而獲得驗證。所以歸納法既不排除科學驗證，同時也有助於新資料的進一步累積，只是歸納法本身不能立即提供既有理論的驗證而已<sup>(11)</sup>。

相對於歸納法，演繹法則被認為具有高度的科學性，演繹邏輯決定了兩個以上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提供科學家一個價值中立的推理依據。根據演繹法，科學家所偵測的任何個案，都變得具有普遍性意義。它使得理論的陳述具有經驗上的可測性，而且也使得今日的理論找到跨越時空的陳述方式，在未來保持其可驗證為誤的特性。演繹法是在用抽象的觀念（但可以量化）來消化每一個個案的時空特性<sup>(12)</sup>。

所謂實證主義，無非不就是企圖透過對結構因素的界定，來說明人行為所受的外在限制何在罷了。結構是跨文化的現象，必須透過推理才能抽象認定。但科學的實證主義，並不關切這種跨文化的先驗結構是否是必然存在，對科學家而言，它一定存在。

結構主義下的實證哲學據稱具有霸氣(Diesing, 1982: 1-20)。在科學家找尋結構的過程中，他們必須否定文化特性。所以，雖然根據某些社會得出的經驗，似乎可以確認到某種結構確實存在，但往往在它被放到其他地區測試之前，就先假定同一結構普遍地

註 10.：在社會科學的哲學裡，事實(facts)與理論是分離的，理論有對錯，事實則無所謂對錯，這表示事實不受理論陳述所影響。果真如此，事實便不屬於科學知識的範疇。但人若不能透過理論去認知事實（因為會使事實受理論所影響），則只好透過感覺去認識事實，如此一來，事實就變成個人的了，因而否定了事實的客觀性。這個關於歸納法的矛盾，見Harré, 1972；關於事實是否真正客觀的現象，見Stanley and Wise, 1983.

註 11.：不過 Harré (1972) 在這方面也仍有保留，認為歸納的結果不能立刻形成理論，蓋歸納不等於解釋，而科學知識的目的正是要解釋。與Harré相反的看法，見 Przeworski and Teune 1982.

註 12.：基於這個理由，科學哲學家認為女性主義者要在科學研究中加入所謂某一性別的觀點，是一種政治干預，所以不必知道女性主義的科學哲學的內容，就可推知其為劣質的知識論 (Alcoff and Potter, 1993).

存在。所以，實證主義有一種偏差，就是傾向於接受科學家研究所在地的「結構」，而忽略新的地區個案中，可能有不同「結構」的存在<sup>(13)</sup>。

但只要嚴守實證主義的方法哲學，科學家可以否認霸氣（即使存在）有害科學。比如說，當人們在研究經濟成長與財富分配的關係時，可能認為成長不利於公平的分配。可是當少數地區看來並非如此的時候，科學家可以辯稱，這些例外地區所看到的財富分配，並非原有理論所定義的財富分配，因而最多只能說，在例外地區不存在理論中所定義的變數，卻不能說理論沒有科學性<sup>(14)</sup>。

關於霸氣的另一種說法，是認為實證主義用的都是普遍性理論陳述，除了理論內部具有邏輯一致性外，不容許其他理論與之共存，因為不可能在邏輯上存有兩個相衝突的普遍性理論主張，在既有的經驗資料中，都未被證明為誤，但他們之間，卻又必須依據演繹推理，相互否定<sup>(15)</sup>。

當然，這種現象並不能否認實證主義。因為，科學家本應根據推理設計出一套非真即偽的驗證方式，決定哪一個理論更真。不過，在實踐上，的確先提出的理論往往取得優勢地位。後來的理論不能只顧證明自己尚未被證明為誤，還必須先證明現存的理論有誤。比如，政治理論經常假設人是理性的，則相反於此的假設，如人是病態的，便常被質疑其合理性，使得病態說必須先能在經驗上否定理性說，才可能被傳播<sup>(16)</sup>。

政治科學家對於科學的執著，相當程度地反映了自然科學家面對自然的焦慮，以及必欲征服自然的那種情緒(Bordo, 1986: 439-456)。由於科學化的前提，是人可以客觀的理解自然，使得自有人類以來的那種關於自然的不確定感，得以消弭(Scheman 1987)。所以，科學追求的是知識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人獲得了超自然的地位，拋棄對自然的恐懼。科學因而取代了神學，成為現代人肯定自己的法寶<sup>(17)</sup>。

政治科學更是如此。政治科學的目的，是要解釋人的政治行為，而且要將人的政治行為，歸因於與個人、文化、時空無關的結構性因素，人似乎不是自己行為的最終操控者。如此一來，對於政治行為中道德混淆與規範盪然的現象，人類自己則勿須負責，因為那是結構下的必然行為結果。

註13：這在方法學上稱之為 Galton's Problem，亦即一個跨文化的社會現象，有可能是因為這個現象真實地反映了普遍的人性，也可能是因為一個地區將自己的行為模式強加於另一個地區，使他們之間看起來沒有差異 (Naroll, 1965: 428-451)。

註14：這種語言定義所取得的理論穩定性，卻與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脫節了，對於「定義」式語言之反思，見 Pitkin, 1972: 60-65。

註15：這顯然是因為實證主義只重視統計相關，而忽視因果解釋。見 Harré 1972。

註16：政治心理學家 Richard Lebow 在一九九〇年舊金山舉行之美國政治科學年會上就有此評論。

註17：任何相對主義、主觀主義的說法，都使人失去基點，而感到恐慌 (Bernstein, 1983)。

相反的，假如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操控者，則政治學家只須研究個案，而不必抽離出跨時空的觀念。新的個案對於舊的經驗沒有意義。政治學科學化的努力反對這種見解。轉而強調知識具有穩定性，因此政治學家不必為自己身為人而感到罪惡，反而可以因為對於人們政治行為客觀結構的發掘而感到舒坦，他們再也不需要追逐特定的政治人物，擔心醜惡的政治會突然爆發，或設身處地的替某個歷史人物說項，只要掌握客觀的結構，便可已超越喧囂的世事，用與俗世分離的心態，分析與己無涉的政治現象<sup>(18)</sup>。

理性的觀念於焉誕生。既然政治受結構所決定，則具有大智慧的政治人物不會試圖去決定或操縱政治，他只會去理解它，適應它，這也是政治學中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立場，他們成為智者的原因，是他們不急於知道誰在玩政治，卻仍可以知道他們必會怎麼玩政治。儘管有許多政治人物並非智者，他們終將因為不遵守結構的定律，而註定失敗，所以他們的行為，只能代表短期的偏差，不影響決定政治結果的科學定律，因此也多為現實主義學派所忽略<sup>(19)</sup>。

現實主義學者的立場，正說明了上述科學家們普遍地對責任的趨避，責任的說法是違反科學的。政治科學家一旦「了解」政治的客觀定律，便應當理性地接受它，科學家不去參與政治或去淨化政壇，未必是出於冷漠，而是出於無奈，而無奈卻也創造了不必負責的安慰，據說，真正的科學家面對政治現象時，既不焦慮，又不憤怒。

## 二、男性的科學

西方傳統的政治理論家，慣於把男性視為理性的象徵，女性則代表感情。女性也常為人視同是深邃不可知的自然，供男性發掘探索。男性是正式的、邏輯的、外在的，女性則屬於浮面的、矛盾的、內斂的。兩性相較，據說男性具有內在自主性，女性傾向於附屬的、依賴的；男性是獨立的、重視分析；而女性卻是被動的，重視容貌。男性積極富競爭性，女性則脆弱無助<sup>(20)</sup>。

註18.：可見，威信政治學知識不是在生活中實踐出來的，而是觀念上的分析成果，研究者（即知者）與行動者可以分離，從而相信知者的研究環境、生涯與成果發表均與研究內容無關。在這方面的批判，見 Addelson, 1993: 265-294.

註19.：此地的假設，當然是擁有「知識」的人比當事者更理解，什麼是對當事人更好的安排。這個假設，否定了當事人在作「錯誤」決定時所獲得的、只有她自己才感受到的自尊與完整，既然知識具有客觀性，當然不被認為受個人自尊感所影響，此所有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必定反對以個人自尊作為進行分析的前提 (Babbitt, 1993: 245-264).

註20.：關於西方傳統政治中男性與女性的刻板印象，有許多佳作，比如柏拉圖曾將女性比成容器，男性則為模型；男性統治女性乃是如君王統治人民（亞里士多德）；女性臣服於男性象徵著理智的遂行（阿奎那）；男人比女人適於自然（霍布士）等等 (Coole, 1988).

不難看出，政治科學的實證主義方法哲學<sup>(21)</sup>，明顯地重申了西方傳統世界中對男性的既有刻板印象，比如，認為政治科學家可以分離於被觀察的政治現象之外，對之進行調查探索。他們用正式定義的量化語言和演繹推理，去分析政治行為的客觀結構成因，他們所得出的理論假設，具有一致的內在邏輯，而且有強烈的排他性。

男性的科學也反映出了男性的盲點。以客觀性為例觀之，科學具有客觀性的這種假設，要求政治科學家仰賴統計方法與量化分析。問題是，量化分析採用大量的數理定義，使得每一個觀念與變數都成為與具體現象分離的抽象定義。這種定義方式，使得語言對於它所發生的特殊環境失去敏感度，因此，被研究的社會，或人物，在使用特定語言時的內在感受，為研究者忽略(Wittgenstein, 1968)。科學家固然可以定義出一套量化語言，讓各國的科學家能彼此溝通，但這套語言放在實際的社會中時，卻反而可能產生出完全不同的意義，以致對於某些社會的分析，可能出現不相干的結論。

以民主轉型理論為例，西方學者研究經濟發展對於公民以個人身份參與政治的影響時，非常強調「多元化」的媒介功能。多元化的現象是根據自主性社會團體的數量來定義。在此地可能發生的明顯偏差，在於不同社會中的個人，在多元化趨勢下固然都能加強政治參與，但是他們從事政治參與的動機卻是截然不同的。有的地方，這種參與是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別的地方，這種參與仍然只不過是提供個人一個表現它忠於所屬集體的另一種管道罷了。定義的多元化與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不相關(石, 1993)。男性的科學重視定義，女性的科學則會注意被研究者的動機與感受。

語言學家中，有人根本不相信會有一種語言可以抽象地定義，且在脫離情境後仍有意義，同一句話隨著情境與人們的動機而產生特殊的意義。換言之，語言必須伴隨著情境，人們對語言的學習，不是經由定義與分析，而是在將語言的聲音與形狀與特殊的情境結合使用而學會的<sup>(22)</sup>。這就保證了男性所學習的語言與女性所學習的語言必有差異。所以，語言不是正式的邏輯，它必須實際被使用，才產生意義。沒有情境的語言，無關乎行為，也不能解釋動機。將語言當成客觀工具的作法，顯然就不利於那些處於劣勢地位的人，這些人當然包括女性。

再以利益輸送為例。如果原來標到一個政府的公共工程要送五十萬元紅包，後來因為種種因素，今天只要送十萬元即可，而一個公共工程可以轉包而獲利六十萬元。照說，即令是一個小人物也應變得趨之若鶩，但是，他出不起十萬元紅包。理性分析家便會

---

註 21：美國政治學中的實證主義所指陳者，千篇一律地是指統計方法 (politimetrics)。

註 22：語言的意義，在於它在實際上經由重複使用而產生了美學、哲學、神學、道德、科學的品味 (Cavell, 1969)。

假設，這個工程標對他不具備效益，其實公共工程的利益對一個人是否有效益，顯然受這個人的收入程度所影響。然而，人皆理性的假設，忽略了理性的內涵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民主轉型的例子裡，這個因素是集體主義的認同，在公共工程的例子裡，這個因素是收入水平。假如我們只說，每個人的行為皆理性地表現出他心中的喜好，那就會因為忽略了情境對喜好的影響，使得抽象地比較人與人的喜好的這種分析，變得與實際行為毫不相關。在這種比較中，男人與女人是沒有分別的，但在實際社會中關乎兩性的價值或期盼卻迥異，可見理性分析將女性從前提中拿掉了。

太多其他的例子，可以顯示正式定義過的量化語言，摧毀了對人類行為動機的根本理解。像國民生產毛額的增加，是否表示人類經濟生活不分性別地增進了呢？吉尼係數的下降，是否表示窮人或女性生活相對改善了呢？這種不重視行為者本身感受的分析，正是科學家對自己的理性、抽象與定義能力高度自信的表現。科學家可以否認貧富不均程度改善必然代表是窮人生活相對改善，而只說是代表他們定義下的財富分配狀況改善了，但問題在於，當人們聽到貧富不均狀況改變時，心理所想的，不是科學家心理所想的，那科學豈不是與實際生活感受完全無關的定義<sup>(23)</sup>。

如前已述及，「不可驗證為誤」的科學標準是不足的。明顯錯誤的理論也可能是無法驗證為誤的。這種標準太強調內部邏輯的一致性與對變數量化的方式，因此使得不同理論之間充滿了排他性。這些理論也具有強烈的自保傾向，科學家之間反而變得難以溝通。這不是因為他們看不懂彼此的定義，而是他們為了保護自己，刻意地在自己的定義上作出獨特的安排，從而使得別人研究的結果，不可能用來否定自己的<sup>(24)</sup>。其結果，男性與女性的行為只能是一樣的，而不能是不一致的。這在數理分析模式中尤其明顯，政治科學家藉著事先聲明各種與現實世界無關（甚或抵觸）的假設，保護他們自己定義與推理出的邏輯，像這樣，政治科學中累積的不是知識，而是一群互不溝通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主張罷了。

當理論似乎被證明為誤的時候，科學家會發揮市場競爭的積極精神加以拯救。拯救之道，是以最不尊重被研究對象感受的方式在進行。比如說，他們可以改變關於事實的假設，或者認為推論的前提未被滿足，因此把原來理論的內在邏輯保留了下來。比如說，當均權體系未能如所預期地促成（不同理論家會說，嚇阻）戰爭爆發時，他們可以重

註 23：女性主義中的一支，因而要求研究者從被研究者的角度觀察，而且可以發展出一套方法來揭露社會上弱勢團體的角度，所要決定的是，每個研究議題中要如何選擇出發點來從事觀察（Harding, 1993: 49-82）。

註 24：結果，不同模式與理論之間的爭議，不能「客觀」地解決，彼此的辯論昇高成保衛科學或保護人類自由之類的政治戰爭（Diesing, 1982: 314-362）。

新檢視「實況」，並辯稱當前世界權力分布並不均衡，所以「理論」仍未被證明為誤，只是它的前提未被滿足。

更等而下之的調整，是改變了變數的定義與量化方式，或加一個新的變數。但如果理論的基礎就是變數的定義，改變定義何異於改變理論呢？執著於原來的理論語言，而竟改變其量化方式，則表示科學家本身對特殊的語言有愛好，而居然這個愛好不是靠改變科學定義所能影響。倘真如此，則科學家豈不是違反價值中立的原則了嗎<sup>(25)</sup>？這種違反，恰恰證明了科學當中是不容許存在因為性別差異所提出的不同解釋，所以價值中立的主張在兩性關係上是不可能中立的。

可見，理論的提出，無論是歸納法也好，或是科學家的直覺也好，都不能說不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實證主義者或許相信，理論的提出受到科學家個人經驗與文化背景影響太深，不能屬於科學的範疇<sup>(26)</sup>，這種對科學家本人情感世界的忽略，說明了何以實證主義者會對於被研究者情感世界忽略。這對於科學發展影響至鉅，值得申論。

如果，科學家理論的提出，是屬於他自己內心感情世界要處理的問題，那麼，根據他的理論假設所定義的變數，當然也間接受這個感情世界的影響，許多社會科學家曾經反思指出，理論建構的方式往往決定了哪一部分的現實世界會被引用，因而不可能不受理論模式來源的影響<sup>(27)</sup>。比如研究暴力的人，也許是有感於街頭亂象，因此他在定義暴力時，不會包括家庭內的暴力，公司內的性騷擾，情報局的洗腦，街頭的餓殍，而這些現象卻可能與街頭暴力關係密切。關切民主轉型的人，也許只樂見到前蘇聯集團進行各種公民票決，卻不在意公民票決過程中的舞弊，或進行公民票決的動機是要壓迫少數民族。

由於科學家的關切已決定了他理論終必有盲點與偏見，將理論的建構與後來的驗證，強行分成前科學的與科學的做法，殊為不智。這種忽略內心感情世界的科學觀，厥為男性科學觀的最佳註腳<sup>(28)</sup>。在此，所謂價值中立的說法，變成了掩飾的說辭，只是要求科學家在定義變數與進行相關性分析時，忘記自己當初的關切而已，但卻完全無法保證在定義時，不受當初的關切所影響。

註25：其實，有人發現所謂的科學知識，在建構過程中充滿了妥協，比如說，「假設」要如何寫，證據充分與否，用哪些詞彙，定義怎麼下，比較廣泛的問題包括意識型態的定位，要讓哪些讀者受影響等問題，使得一項科學研究，必須經過不斷的調整（Potter, 1993: 161-186）。

註26：科學史的研究卻一再證實，科學過程絕非價值中立（Schiebinger, 1989）。

註27：即令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理論建構也受到政治慾望、利益與價值的影響（Harding 1991: 146-147）。

註28：一九八四年震驚加拿大的多倫多醫院病童案，法庭辯論中律師在對男醫師諮詢希望了解他們「知道」（Know）的，質詢女護士時則要求她回答自己的「經驗」（experience），好像知識屬於男性，感覺屬於女性（Baumgart, 1985: 20-22）引於 Code, 1991: 222。



男性的科學反對主觀主義，以便能實現理性的迷信。自然界和政治現象等「客觀」對象重複了關於女性的刻板印象，是屬於無關乎理性的研究課題。矛盾的是，這種反主觀主義的傾向，只容許科學家對人們的非理性的主觀現象，從事客觀研究，而不容許進入她們每一個研究客體的主觀世界進行分析，因為這等於是否定了客觀規律的存在，換言之，他們相信有一種理性的、客觀的分析方式，去理解人們非理性的、主觀的行為結構。

男性的科學反對太進入各別的情境，以免受行為者情緒所影響，反對任何加入時空條件的歷史敘述，反對英雄主義，研究的對象沒有人的特殊性，他們將失敗與混亂的根源歸結於自然界的規律，或非理性行為者錯誤的認知<sup>(29)</sup>。他們獨立於研究課題之外，代表普遍性的真理。這種科學哲學觀，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誤解，偏差，與不相干的理論架構，也製造了科學家彼此之間諸多無謂的爭辯與自衛。無怪乎近世後現代主義作家出現後，必欲對此一方法哲學解構而後已。

### 三、女性主義的反思

當代社會科學對於知識的看法有所偏頗。對政治行為的解釋，實在不能單純地靠將兩個以上可以量化的變數，做統計相關性的分析。不僅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在統計上相關的變數，不能隱含彼此之間有因果關係，即令是有因果關係，也往往難以判定，孰為因，孰為果。有關分析的檢討，早有文獻，本文只列舉其較明顯者。

首先，統計的相關性有可能是導因於第三個未被確認的變數，而非真正是兩個被發現具有相關的變數之間真實的相關。其次，統計相關的分析，假設了自變數不受應變數的影響，這與政治現象的分析常不相符。而加入時間考量之後的相關性分析，在定義上與量化技巧上都十分複雜。使得分析結果失去可閱讀性。第三，相關的變數之間可能存有各式各樣、直接或間接的因果關係，無法肯認某一特定理論模型的正確性。

女性主義的哲學，對於主觀價值、微觀經驗、與研究者本身進入情境的能力多所肯認。研究者的目的，不限於單純地做抽象分離式的思考，而是要親身體受行為者在特定時空中之感受，以能了解其行為的動機。她們關切文化背景與集體主義對於行為者個人的影響，企圖界定行為者的終極關懷所在(Hooks, 1983)。這種進入情境的作法，是要建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心與神會的機制，用體會、認知與類比來做解釋。所以女性主義方法學不僅要從女性的生活經驗出發，也鼓勵從所有在政治過程中疏離出去的人的立場看政治學。

---

註29：也因此，科學似乎有反改革的保守傾向，因為它傾向強化現有的社會迷思 (Haraway, 1988)。

其實，實證主義的方法哲學，在物理學界都未必具有完全的主導。科學的解釋可以超越所謂的統計相關性的分析，改而強調因果機制的界定。所謂因果機制，當然就是透過觀察（或體驗），將行為發生的原因，依照因果過程描繪出來。以病理學為例，細菌的發現，是科學家透過想像，假設有細菌存在，再透過後來發明的顯微鏡，觀察到細菌傳染疾病的過程(Harre, 1972:65)。在上述這種強調實際因果機制的方法哲學中，圖示解釋的重要性就超過相關性分析的重要性。圖示解釋容許科學家將理論的起源、建構、到證據的蒐集，均視作科學的範疇；並不因為這其中包括了科學家自己的想像，就將之排除在科學的範疇之外。圖示解釋因而追求將因果的過程具象化，以協助研究者進入行為者的情境<sup>30</sup>，不僅要同情被研究者，也要思索一下，這個同情對於被研究者有什麼意義。這個過程，使得研究者能從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研究者自己的動機。圖示法的假設反映了女性主義的關切，就是人與人之間必有關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不是分離的。

這種立場，或可稱之為神入(empathy)分析法，它要求研究者設想自己就是行為者。實證主義的方法學者認為這種方法充滿了主觀，且有不可克服的障礙，因此迴避此一步驟，假設被研究者的主觀行為與解釋不相關<sup>31</sup>。最有名的說法，就是研究鳥的學者，一定比鳥要更了解為什麼鳥會飛<sup>32</sup>。其實這種戲謔的看法，有兩個謬誤。首先，他提不出為什麼去了解鳥的想法不能增進對鳥會飛的理解。心理學家已經透過實驗，證實一隻從小就被綁住的大象，長大以後，雖可輕易掙脫，但卻根本不會嘗試掙脫。作這種關於鳥的認知的研究，其實一點也不必違反實證主義的哲學。

其次，如果實證主義的假設，是鳥不會想。是否也表示在研究人的時候，應該假設人也不會想。由於研究者與行為者同樣是人，為什麼只關切研究者所想的客觀結構，而不關切行為者心中的主觀動機。這種認為人其實沒有自己的假設，恰恰也與男性觀點中，女性沒有自己的這種刻板印象，有所雷同。

神入分析法在對比較政治學中的區域研究，應該格外具有啟發性。在當前的比較政治學中，經常看到學者以歐美社會經驗所建構的理論，去解釋第三世界的現象，免除了科學家深入觀察非西方社會的麻煩。換言之，科學家在作跨文化比較分析時，往往因為對當地社會了解不夠，無法有效界定相關的變數，而是以自己生活經驗中的變數拿來適用，而又在定義時對當地社會欠缺敏感度，使得同一變數對於不同社會的人有了不同的

---

註 30. : Harre(1972: 73)甚至主張科學知識是人們所能知覺到的知識，知覺不到的過程或事物不能算科學。

註 31. : 女性主義者稱之為「角度」(standpoint)分析法(Harding, 1991: 119-134)。

註 32. : 數理政治學家 Peter Ordershok 在一九九一年的美國政治科學年會(華盛頓特區)上作此類比。

意義。這本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基礎課程必然會檢討的缺失，有趣的是，在實際研究過程中，這個缺失難以改進。

女性主義的觀點在神入分析中有具體而微的體現。神入分析法要求研究者附屬於行為者，不作抽象分離；要求研究者體會行為者的感情世界，而不是將之視為不重要。所以研究者不只是一個獨立的、理性的、客觀的分析者，而也是一個依賴的、殷切的、關懷的參與者<sup>(33)</sup>。研究者抱的是同情的態度，不是批判的立場；要觀察的是全面的、完整的行為動機，不是部分的、解剖過的結構定義。但這種堪稱為新政治科學方法哲學的作風，也必須面臨實證主義已碰到的問題，即如何在不同的社會科學家之間建立可以溝通的管道呢？

神入分析法所可以仰賴的是「類比」<sup>(34)</sup>。所謂類比，是把一種已經知道的事物的原理、過程，比擬成未知的事物的原理、過程。而所謂已知的事物，可是在實際上已經找到的因果機制，擁有科學證據的事，也可以是實際上並未發生，但在觀念上可以繪製出來的一套因果機制圖案，透過圖案的展示，協助研究者進入行為者的情境<sup>(35)</sup>。

類比的使用，是將事物的原理作整體的轉移，使用的不是符號邏輯，而是觀念上圖示的因果機制。所以，用肉眼解讀類比圖示，也是在用腦的右半葉，故糾正了推理邏輯只用到腦的左半葉的偏差。其次，類比的使用可以免除抽象定義、語言轉換和量化時發生的意義扭曲或流失。第三，類比的使用，是要協助研究者進入當地社會的情境，故是以被研究對象為主體的一種思考方式，所以類比理論不具備排他性，而是一種有條件的適用，這正是女性主義研究者所要求的態度<sup>(36)</sup>。使用類比的目的，在於說明被研究案例中的因果機制，而不是要表明某一抽象理論尚未被證明為誤。

當然，類比的圖示也不可能完全地將個案中的因果機制一成不變地展現，而且難免也會發生扭曲。具有男性氣質的社會學家在使用類比時，也會本末倒置，把某一類比的情境（比如囚徒兩難論），當成了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真理，因此忘記了類比的原始宗旨，本是要展示個案中的因果機制，而不是推銷類比中的邏輯。比如說，有人將社會比

註 33：研究者是否能在道德上與認知上真的自給自足 (Code, 1991: 110-172)。

註 34：不過，也有的女性主義者認為「類比」較諸「統計相關分析」更具性別偏見 (Harding, 1991: 44-45)。其他人則認為，重點應該在於研究者必須時時了解被研究角度的道德與政治含義 (Code, 1991: 323)。

註 35：有人稱類比提供了一種知覺上的「肖像」(icon)，並相信所有科學理論都有一個或一些肖像在引導。這個說法與 Harré (1972) 對「知覺」的重視十分類似。參見 McCamant, 1984。

註 36：類比與統計相關的分析之所以不同，在於類比法更容許研究者進入被研究者的情境（雖然未必如此），起碼，它可以協助證實「在知識的領域中，存有多元的技巧、程序和方法」，使得過去的被研究者也得到研究自己的工具 (Grosz, 1991: 210)。

擬成有機體，本是要說明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時的適應與協調。有機體有健康與病態的分辨，但未必社會狀態的健康和病態也可以作出明顯的區分，如果強將每一個社會都分出病態指標，可能不見得恰當。

既然類比也會造成對實際因果機制的扭曲，則女性主義的解救之道，在於承認每一個個案，都需要多重的類比模式來呈現他的完整（相對而言）面貌<sup>(37)</sup>。這時，不同社會之間的比較成爲可能，某一種類比圖示可以在許多社會中都具有說明的作用，其他的則可能只有助於說明少數的個案，個案之間的比較，則在於多重類比模式的組合各有千秋。事實上，每一種實證主義下的理論模式，都可能隱含有某個類比模型，只是他們拒絕把這個過程當成科學的哲學來研究。而且，這些隱含在後面的類比模型，很可能可以說明研究者自己的經驗，只是這個經驗常在統計量化之後，失去了原創性，而沾上了霸氣。

類比方法的最大缺點，也正是實證主義者所不會放過的焦點，就是研究者如何判別一個好的類比，與不好的類比。比如說，把社會劃成三角形階層的菁英理論，劃成橫向切割的階級理論，與劃成縱向切割的組合理論之間，要如何配合與取捨呢？這裡可能沒有客觀的答案。不過，類比要表達的是事物原理中的相同部分，至於扭曲過的，原本不同的部分就必須要靠其他類比模型同時使用來彌補。近年政治科學中類比模型層出不窮，幾乎可以斷定，他們每個都是既非全對，又非全錯。與實證主義最大的不同，正是神入方法哲學是以呈現研究對象的情境爲根本的，規範性的指導原則，而實證主義則要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尚未被證明爲誤的真理式陳述爲首先要著。

#### 四、女性主義知識論的挑戰

無論是神入分析或類比研究，均不是單純地在發掘那個所謂客觀的知識。如果女性主義的政治研究強調的一樣只是一種唯一的真理，則與當代的政治學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罷了。換言之，來自女性主義的批判，針對的不僅止於研究方法而已，更深刻的反思，是關於政治學知識本質的問題。固然女性主義的研究會比較同情質化的研究途徑(徐，1993)，但如果質化研究的目的是要去找一個客觀規律的話，仍有可能延續了當代政治科學的霸氣。這是否表示女性主義的政治學不相信有客觀的知識呢？

---

註37：多重類比、肖像、研究主體的並陳，有助於在不同情境中的人彼此溝通，建立具有客觀性質的知識 (Harding, 1991: 268-295; Longino, 1993: 101-120).

其實，女性主義的政治學未必同意使用『方法學』這樣的說法，畢竟方法學存在的前提，是假設有一個人人可用的途徑，通往一個共通的知識境界。對於某些女性主義知識論者而言，她們的批判遠遠超越了方法學的層面。這個批判同時是研究主題的批判，也是研究態度的批判。

簡單地說，女性主義的政治學家會要求政治學者了解，一般的政治學知識有研究角度上的限制。人們通常必須先確立一個問題意識，才可能談論方法，而這個問題意識幾乎就決定了依此產生的政治學知識，到底是誰的知識。比如說，政治學界很重要的一個辯論話題，是資產階級有沒有控制國家機關，藉著國家的名義作出有利於資產階級自己的資源配置。在這個辯論中學者關切的是那批擁有國家名器的人如何使用社會上的生產力，自然不可能認識到社會尚有許多的利益衝突，並不是在國家機關或國家領域之內解決的。事實上，那些已經在國家機關外解決了的（不論是否公平）利益衝突，根本沒有機會成為政治學知識的一部分(石, 1994)。

自有政治學以來，政治學家就沒有注意到，對於社會資源配置權的爭奪有一個前提，就是生產力的根本來源在於生育力，政治學家傾全力去研究生產關係，忽視生、養育關係(Rubin, 1990: 74-113)，在於生、養育關係中的潛在衝突已經被解決了，從而無法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政治學家雖然可能無意助長在生、養育關係中主導一方的勢力，但對於生、養育關係的忽略，卻必然有助長他們勢力的效果。此所以政治學的知識，有利於生，養育關係中的主導一方，因此不是客觀的知識，但這卻不妨礙他們他們宣稱自己的方法是客觀的。只是，在女性主義的批判中，這個客觀的方法，完全不能保證所產生的知識是客觀的。

從對生、養育關係的忽略出發的話，人們可以發現，沒有一種政治學的知識是客觀的。過去有人辯論，科學家的工作是研究與發現，不能將研究工作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歸為科學家的責任。依此推論，原子彈的發明與它實際的使用是兩不相干的考慮。然而，如果愛因斯坦當初有一丁點的懷疑，以為原子彈會用來炸猶太人的話，它會去助紂為虐嗎？似乎關於原子彈的知識只能說是盟軍內部的客觀知識，但絕不是當時日本人（甚或今天的猶太人）同樣歡迎的知識。

一個問題意識往往有種族、宗教、地域、（名義上的）國家、性別等等方面的背景。政治學家多半只關心出現在國家領域理的問題意識，而不詢問這個問題意識的來源，從而保證了政治學的偏差。此一偏差從（國家領域以外的）生、養育關係的角度看來格外明顯，但卻完全不限於生、養育關係。每一項政治學知識所提供的解釋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資源的配置，只要這個知識有現實世界的效果，它就只能是一部份人的知識。

有時，雖然一項研究好像照顧到了所有的人，但卻忽略了他們對這個知識所帶來的『好處』有不同程度的需要，也因此有不同的機會成本。比如美國研究星戰計劃以使全球免於核戰，雖然每一個人都受益，但這個好處可不是亟須社會福利，渴求環境保護的人所消受的起的(Sen and Grown, 1984)。

女性主義的知識論因此不止限於對生育關係的關切，而更是對知識的多重角度的認知。這就成了研究態度的問題了。所謂研究態度有『區分』與『契合』兩層意義，這在目前本土心理學的反思過程中也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主張。區分的要求，是希望研究者把自己研究出來的知識，與多重的、全面的知識要做區分(朱, 1993)。契合的要求，是希望研究者能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研究的意義(楊, 1993)。無論是神入分析或類比研究，其最終的目的，不是要協助研究者去解剖被研究者行為的深層動機，入侵她們的生活，找到一些她們的行為規律而已，更是要協助研究者打破他傳統上與被研究者的疏離心態，從而也克服被研究者對研究過程的疏離。所以，女性主義對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界線的超越極為關切，其程度遠遠大於對某研究者與其他研究者之間界線的超越，前者是知識論的範疇，後者屬方法論的關切。

回到上述關於客觀知識存在與否的問題上，女性主義的批判不必被視為是知識相對論的主張。女性主義容或不相信單一的客觀知識，卻也未必要從根本上推翻客觀的說法。只不過，任何知識不得不包括對主觀立場或角度的認知。故知識的產生，不應該只被視為是一個發現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一個全面的知識必須包括根據這個知識而產生的所有現實效果。既然沒有一位研究者或研究角度能有如此的廣泛性，則研究者的態度與敏感度都竟成為知識論者所無法迴避的內容。

當代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主要的對象，是以國家名義行使的權力。政治學的前提是國家，因此不會去研究國家的存在代表什麼意義。既然國家是國民的集合體，則對國內權力的爭取自然也被視為是全體國民的活動。從西方女性主義的分析觀點中可以發現，她們致力所要解構的那個政治學的知識，主要就在於以研究國家為對象的政治學。

由於政治學者從國家出發，所以研究的基礎往往是要先定義國家何在。國際政治學裡的國家是透過主權來界定的(Walker, 1993)，也就是藉著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來定位自己，但這仍不能解決國家何在的問題。進入國內的領域，國家是藉由與社會的不同來定義的(Evans et al., 1985)。有趣的是，政治學界成天在爭論國家與社會的界線何在，在決定這個界線何在之前，多數人完全不懷疑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的確存在，因為一定要維持這個界線，當代政治學才能繼續存在！

已經無條件地接受國家觀念的政治學者，自然會研究這個國家如何保護自己。保護

的前提是我的國家與其他的國家有別，所以保護國家的行爲與研究國家如何自保的學問，都有效地維護了國家這個概念。概念上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分離且又對立的印象，使每個擁有國家名器的人都感受威脅，被保護的需要就決定了國家觀念中的暴力（即國防）特質，也決定了男性在國家領域裡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Reardson, 1985: 16)。實證主義的政治學從來不研究國家觀念所造成的效果，只研究誰能擁有國家名器。被研究者的終極關懷或深層動機概被忽視。只有在被研究者的行爲影響到了國家名器的運作時，她那一部份的行爲才會受到重視。

顯然，與暴力結合的國家概念，並不適合每一種人的生活經驗。既然歷史實踐所建構出來的國家，不能涵蓋不在所謂國家範疇裡活動的人們，關於國家結構的知識自然也將這些人的經驗排除在外。一旦有關於國家結構的知識如此建構了之後，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人，不得不對國家感到疏離，她們既不能成爲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更不能奢想改變政治學研究對社會資源分配所已然造成的『客觀』偏見。

女性主義的知識論要求將國家觀念的建構與持續當作權力現象來研究，此何以她們的口號是『政治無處不在』(Philipson, 1982: 55-77)，這當然也就包括了家務分工，蓋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對既有的『公』與『私』、『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等等概念有強化作用，成爲女性主義必當打破而後已的迷思。如果家務分工就是政治權力的現象，則政治學裡不研究家務分工恐怕也是一種權力現象，將這種部分權力現象排除於普遍性客觀規律的研究與傳授之外，有效地延續了國家的概念，也保住了政治學家的學科認同。

爲了政治學的學科認同所付出的代價，就是衍生了前述的霸氣。女性主義的知識論沒有霸氣，究其因乃係認識到知識的多種角度並存特性。不過，倘若女性主義學者一意由解構國家著手來重建政治學，勢必受到全面的抵制，此何以即令是女性主義這種不相信單一客觀真理的知識論，也不得不談以單一客觀知識爲前提的方法論，只不過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是以凸顯研究者本身偏見的神入分析法，及以協助研究者體會被研究者疏離情緒的類比法爲主。

總而言之，女性主義知識論的關切，使得政治學者對於弱勢團體的立場（或無立場）能被認知到。人們在女性主義知識論之下所主張的微觀分析方法，則超越了質化研究的考量範圍，更是要去暴露每一個研究課題與問題意識背後的主體何在，偏見何在，角度何在。儘管切入的途徑不同，對未來的政治學發展評估也相異，多數女性主義政治學者似乎都有一個長期的共識，亦即女性主義政治學的真正起點，必須等到國家觀念被徹底解構，政治無所不在的現象受到認可之後，才算開始。

## 五、結 論

女性的政治學方法，主張研究者學習採用行爲者的角度看問題，因而能對行爲者的終極關懷，以及行爲時所處的特殊情境，有心領神會的效果。而這種能力的培養，必須靠對研究對象（人、組織或社會）的理解，這包括她的歷史背景，語言結構和現實考量在內。因此而得出的體會，透過類比模型來表達要勝過透過變數模型來表達，因為前者是以被研究對象為主要關切，後者是以研究者自己的理論建構為主要關切。

由於政治現象無法直接觀察，所以必須設法使她具象。類比模型藉著對因果機制的描繪來做到這一點，變數模型則仰賴抽象的符號。符號模型與類比模型本可相銜接，由符號將圖形轉化成可以為眾人共識的變數，再由眾人自己將變數轉化回自己文化背景所可以理解的圖示。但是，這個過程往往因為男性科學霸氣的作祟，使得追求普遍化真理的趨力，取得排他性的、絕對的地位。

無論如何，類比模型與神入方法哲學對於研究比較政治現象較為有效，因為圖示因果機制不像變數模型那樣容易受人為操縱，那樣容易變得不具有現實性。符號模型在適用時，也因個案現象缺乏該類變數的資料，使得變數模型的量化分析傾向武斷。女性主義政治方法哲學要努力思考的，是如何發展出能有效整合多重類比模型的方法，以及銜接類比模型與變數模型之途。最先要進行的工作，當然還是必需要軟化男性科學哲學的霸氣。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份

石之瑜

1993 「威權轉型理論的美國盲點」美國月刊· 9·

石之瑜

1993 「誰的改革開放？女性主義對中共政治經濟的反思」。 共黨問題研究 20  
(2): 14-24。

朱瑞玲

1993 「台灣心理學本土化之回顧與展望」。 本土心理學研究。1(6): 89-119。

徐宗國

1993 「適宜用質的方法研究女性現象」。 婦女研究通訊· 30 (9) : 14-15。

楊國樞

1993 「我們爲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1(6): 6-88  
。

### 英文部份

Addelson, Kathryn Pyne

1993 "Knower/Doer and Their Moral Problems." in L. Alcoff and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Alcoff, Linda and Elizabeth Potter

1993 "Introduction: When Feminisms Intersect Epistemology." in L. Alcoff & E.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Babbitt, Susan E.

1993 "Feminism and Objective Interests: The Role of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s in Rational Deliberalization." in L. Alcoff & E. Potter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Baumgart, Alice

1985 "Women, Nursing, and Feminism." Canadian Nurse. (January,

1985): 20–22.

Bernstein, Richard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Bordo, Susan

1986 "The Cartesian Masculinization of Thought." Signs: The Journal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1 (Spring): 439-456.

Cavell, Stanley

1969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Code, Lorraine

1982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ism for a Theory of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2 (June): 157-174.

Code, Lorraine

1991 What Can She Know?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th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ole, Diana H.

1988 Women in Political Theory : From Ancient Misogyny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Boulder: Lynne Rienner.

Diesing, Paul

1982 Science and Ideology in the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Evans, Peter,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osz, Elizabeth.

1993 "Bodies and Knowledges: Femi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ason." in L. Alcoff & E. Potter(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Harding, Sandra

- 1993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in L. Alcoff & E. Potter(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Harre, R.

- 1972 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ory Su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oks, Bell

- 1983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Hubbard, Ruth

- 1990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Jaggar, Alison

- 1989 "Love and Knowledge." in Alison Jaggar and Susan Bordo(eds.),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enheld.

Keller, Evelyn

- 1984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Kline, Morris

- 1980 Mathematics: The Loss of Certain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gino, Helen. E.

- 1993 "Subjects, Power and Knowledge: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s in 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in L. Alcoff & E. Potter(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McCamant, John

- 1984 "Governance without Blood." in M. Stohl and G. Lopez, States as Terrorist. Westport: Greenwood.

Naroll, Paoul

- 1965 "Galton's Problem: The Logic of Cross-Cultural Analysis." Social Research, 32 (Winter): 428-451.

Philipson, Ilene J.

- 1982 "Heterosexual Antago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ing." Socialist Review. 66 (November-December).

Pitkin, Hanna

- 1972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tter, Elizabeth

- 1993 "Gender and Epistemic Negotiation." in L. Alcoff & E. Potter(eds.), Feminist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 1982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Malabar, FL.: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

Reardon, Betty

- 1985 Sexism and the War Syste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Rubin, Gayle

- 1990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K. Hansen and I.J. Philipson (eds.) Women, Class and Feminist Imagin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cheman, Naomi

- 1987 "Otherello's Doubt/Desdemona's Death: On the Engendering of Scepticism." in Judith Gonova (eds.), Power, Gender, Value. Edmonton: Academic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Schiebinger, Londa

- 1989 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n, Gita and Caren Grown

- 1984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tanley, Liz. and Sue Wise

-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alker, R.B.J.

- 1993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ttgenstein, Ludwig.

- 196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E.M. Anscombe. New York: Macmillan.

# 女性主義的政治學方法論

石之瑜\*

(中文摘要)

當代政治科學方法隱含了強烈的男性觀點，因此對於政治科學化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與不可逃避的僵化。在此，女性主義的思潮，對於政治學界的科學迷信，當有所助益。女性的政治學方法，主張研究者學習採用行為者的角度看問題，因而能對行為者的終極關懷，以及行為時所處的特殊情境，有心領神會的效果。而這種能力的培養，必須靠對研究對象（人、組織或社會）的理解，這包括她的歷史背景，語言結構和現實考量在內。因此而得出的體會，透過類比模型來表達要勝過透過變數模型來表達，因為前者是以被研究對象為主要關切，後者是以研究者自己的理論建構為主要關切。依照女性主義的知識論，一項全面性的知識，不僅要考慮被研究者的觀點，也必須說明研究結果對於被研究者的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影響。

關鍵詞：女性主義、政治學、方法學、知識論、社會科學、國家

---

\*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Chih-yu Shih*<sup>\*</sup>

(ABSTRAC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has a strong men's bias. The behavioral studies of politics produce pseudo-scientific terminology and cognitive incapacity in current scholarship. Feminist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empathize with the "objects" of the study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inner source of motivation behind each political act. This feminist methodology requires an willingness on the part of the researcher to learn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ose under study.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analogy" as a scientific metaphor is much more appropriate than as a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Analogy" does not have to exclude the centrality of the objects in constructing knowledge while "correlation" does. Finally, a feminist epistemology would also require 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 to include its effect on the objects of research from the objects' standpoints.

**Key words :** feminism,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epistemology,  
social science, state

---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